

一位母亲的自我探寻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裴思童

2022年，作家梁鸿终于为自己长时间的消沉和痛苦找到了原因。前一年，她刚出版了“梁庄系列”的第三本书，这套描写中国乡村的书籍让她在过去十几年声名鹊起。但她的另一重身份，作为一位母亲，却让她不断受挫。

10多年前，在写第一本书时，儿子刚3个月大，睡在回河南老家的火车上，摇摇晃晃。她躺在儿子脚头，用两腿圈着他，保护他不会摔下去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不能再“圈住”儿子。母亲的早逝让她极为看重作为母亲的身份，她自认尽心尽力做母亲，想成为一个好妈妈，但面对儿子成长中的问题、精神上的困境，她感到迷茫和焦虑，甚至感觉自己越努力，便离他越远。

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困境，她意识到，“这是一个社会问题”。她和身边的朋友聊，很多孩子“好像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”，大家对此“欲言又止、不愿面对”，但同时也非常焦虑。她做调研，看到那些令人心惊的数字，意识到“一些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已经如此严重”。

这迫使她超越自身经验，再次拿起笔，放下过往书写的母题——关于故土、乡村和父辈们——着眼于我们的下一代。

她将新书取名为《要有光》，让光亮照进来，让家长和孩子们看到改变的可能。这是她作为一位母亲，想要进行的探寻。

以下是她对记者的讲述：

“大梦初醒”

想写这本书其实是源于我自身的困惑。面对孩子的成长，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，包括孩子学业上的、情绪上的以及他自己精神上的某种挣扎，我对此是非常迷茫和压抑的。

我觉得我尽心尽力地在做母亲，努力去理解孩子，但我发现事情没有我想象得简单，并不是我努力了就会做得很好，有时反而越努力，便离他越远。在和他朝夕相处的某一个瞬间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自己的很多观念和做法，其实并没有真正关注到孩子的内心世界。我的痛苦和他的痛苦，虽然是两个人之间的，但实际上又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这给当时的我带来一种极大的思维上的震撼，我意识到我应该去反观自身，反观我对于孩子的种种观念，因此我也学习了很多心理学知识。

而真正让我想要开始做调研，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有许多孩子，好像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，父母对此都很焦虑。我在查阅资料后发现，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，一些数据特别惊人。我觉得我个人的和身边的经验已经不足以涵盖其中的复杂性，这也让我想要超越自身，进行一种更广阔的社会关注。

我首先在网上发了一个征集，雅雅是第一个回复我的孩子。这本是一个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对自我要求很高，但在她升入当地最好的高中后，在众多尖子生中间，她变得紧张焦虑，最终甚至恐惧到没办法去上学，一想到考试，手就抖得厉害。

我曾经去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调研，中心负责人说，他接触过无数青少年案例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，问题是如此复杂、普遍，让他深感个人力量的微小。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学业负担越来越重，很多时候青少年是承压的底部，像神经末梢一样。

我书里写过一个叫李风的孩子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个孩子就变得异常沉默，坚决不去上学。他的妈妈文莉奉行“快乐成长教育”，从没

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作家梁鸿

受访者供图

给孩子报过补习班，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文莉其实很迷茫也很痛苦。

我与家长们坐在一起分析的时候，有一个家长就谈到，虽然家庭没有要求，但李风作为一个实际上成绩不好的孩子，他在学校里可能长期是处于被忽视的状态。他的班主任直接表示，自己的精力很难照顾到他这样“后百分之二十的学生”。甚至李风去一家快餐店应聘实习生，陌生的店长都可以随意批评他，就因为他学习不好。他几乎被悬置起来，好像被社会系统抛弃了，被教育系统抛弃了，没有可供他生长的土壤。

李风和我采访的其他孩子都不太一样，他身上没有强烈的情感，无欲无求，好像被什么东西给隔离起来。因为很多人从小到大都缺乏自主思考的可能和空间，被动地被安排绝大多数事。而人一旦没有了自驱力，就缺少了生命力。

比如说我采访过一个男孩，他在一所省内的“超级中学”上学。他告诉我，他在学校里大便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，很多孩子便秘、有痔疮。因为学生们每天从早上5点半起床到晚上10半熄灯，每个时间段要做什么都是安排好的，400多个学生需要在仅有的休息时间里抢几个厕所蹲坑，孩子们根本没时间大便。

他形容自己的状态就是浑浑沌沌、盲目地跟着大家流动。有人说现在的孩子很多是“空心人”，但其实我们这些大人很多才是“空心人”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让我们的孩子在健康的环境下成长，反而给他们塑造了一个高控制的、高竞争的环境。

我在大学任教，发现很多学生在人际关系上都存在很大的困惑。因为这些孩子从小到大都一心扑在学习上，从早上7点到晚上回家，连和小区里的朋友一块儿聊天的工夫都很少，如何很好地建构人际关系呢？我们无形的教育观念实际上是非常有形的，这种氛围是每个孩子都能感知到的。

这种氛围同时也在影响着家长。在

整本书中，我唯一一个实名撰写的地点就是北京市海淀区，因为海淀区作为中国教育的某种核心，具有难以代替的象征性和隐喻性。我觉得很多海淀家长可能是世界上对孩子投入最多的一批家长，其中很多“高知”父母为了将孩子送去最好的学校、享受最好的教育，不管管是精神还是经济上，都几乎毫无保留地付出。

比如说我采访的陈清画，这是一位极为负责的母亲，自身非常有修养，家庭条件也很好，把几乎所有的爱和希望都寄托给了孩子，也会努力为孩子学习和成长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。所以当她的女儿出现精神困顿不想上学时，她非常痛苦，她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自己已经尽了最大努力，孩子依然会这么想。

她可能没有意识到，虽然她在生活上努力照顾孩子，但在精神上，孩子感觉自己被抛弃了。比如她想让儿子走竞赛道路，但儿子有自己的理解，他想自主学习感兴趣的知识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儿子身上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和挣扎。而陈清画没有察觉，还在用各种方式“威逼利诱”儿子坚持。所以儿子最后会控诉她，表示自己没办法在家中感受到温暖。

我自己也是一名“海淀家长”，在养育过程中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给孩子带来了压抑。你以为你做的是出于爱孩子的选择，一个母亲的选择，但其实首先是你自己的选择。

我觉得我们很多家长对孩子是有功利诉求的，希望他好好学习、出人头地，不能成为普通人。如果孩子达不到，我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，行为上也会出现偏差，这最终都会让孩子承受。

但你要知道，一定是更大比例的孩子没有考上顶级大学，所以我想许多家长都要在不同程度上经受“精神破产”。就像我写到的沈春，这个一心想将孩子送进“清北”的妈妈，在儿子高考失败后陷入了极度崩溃，但她也形容自己仿佛“大梦

初醒”，她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一直被某种话语裹挟着，让她相信只要自己的孩子没有考上顶级大学，她就是失败的，以至于她忽视了儿子身上的其他优点。

“我们要反思”

在写这本书时，虽然我谈到了很多家庭问题，但我始终避免把错误完全放在家长身上。另一方面，我也特别想避免写成都是社会的错，家长也没办法，我们都被裹挟。我觉得如果这样写，会是失败的。

我一方面想要呈现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人的无奈，我也想要探讨我们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在哪里？社会系统是由我们每一个个体塑造的，作为有主体性的、有能动性的成人，我们每一个人依然需要自省，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孩子“生病”了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改变？

事实上，在我整本书的调研过程中，我最吃惊的部分恰恰是，作为父母，我们有时候对于孩子真正的内心想法是相对无知的，我们不知道怎样真正去了解孩子的心理，并且对此缺乏自省。哪怕所谓的“高知”家庭，那些自认为非常爱孩子的家长，都可能出现这个问题。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自我批判。

在调研之初，通过雅雅我认识了阿叔，一个心理咨询师。他开了一个补习班，收留了很多休学或者失学在家的孩子。我在那里从早到晚待了一段时间后，意识到这个补习班很有书写价值，因为它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。

这是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，在这里的家长和孩子都是相对放松的，他们能够在里面说一些真心话。

在这样的对话中，我发现很多时候家长的担忧和孩子的恐惧其实是擦肩而过的。比如说小丽妈，她的女儿严重厌学，甚至恐惧到不愿出门与外界接触。但当她的女儿提出或许可以去私立学校上学时，小丽妈的第一反应是否认，觉得女儿又在给自己找退路。她不知道小丽内心真正的恐惧和担忧。

所以虽然她是一位非常努力的母亲，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学习心理学，希望能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对话空间，但她依然没有走到小丽心里。我们对于孩子会有理解上的错位，我们总是被一些东西蒙蔽，而没有意识到更本质的问题。我们经常会说我供你吃、供你喝，什么都给你了，你还这个样子。但是这样的话语背后，其实包含了很多我们思维的问题。

在书中，小关是一个让我心痛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因为恐惧学校不愿意出家门和外界交流，而就在他逐渐向好时，他和妈妈产生了一场冲突，他妈妈不断敲门逼迫小关开门交流，最终导致小关在之后两年中，再也没出过房门。小关的母亲其实是急切地想要孩子好，但她确实在方法和观念上，使得小关更加封闭。

这也是我为什么把这本书写得这么细致，就是希望让我们这些成人意识到，在很多时候，恰恰是那些细致而微的事情，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。

而当我走进县城，我发现这里又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问题，因为这些孩子甚至很少见到自己的父母。

比如说花臂少年，当我走进他的家庭时，我发现这个孩子真的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怀。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就离开了这个家庭，父亲常年在外打工，他跟着奶奶生活到13岁，在奶奶去世后，辍学一个人跟着他的朋友们游荡。萦绕在这个花臂少年周边的是这样一种荒寒的、没有情感的氛围，不管是物理的还是心理的，他都没获得支撑。

我也很希望这些孩子的父母能够听到这份呼唤，因为孩子们的问题太迫切了，我们一旦错过孩子的童年，很可能便错过了他的一生。当然我也知道这些父母外出打工也是生活所迫，所以我觉得社会支撑还是非常重要的，单指望一两个父母的自我觉醒，这个力量太微弱了。

在这本书中我试图重新还原塑造孩子出现问题的场景。因为问题的成因是很复杂的，它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，孩子的问

题只是一个结果，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具体的语境下去思考和体会，才有可能去看到这里的混沌与复杂。

“要有光”

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非常痛苦，也很压抑，几度想要放弃，大病了好几次，但最终总算完成了。

我是因为太过迷茫和痛苦而写作的，但在调查过程中我不断地学习和反思，好像找到了一些应对问题的方法。但问题永远会不断地产生，没有什么一劳永逸，你必须要谨慎地面对你固有的那些观念，你必须要跟着你的孩子一块儿成长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终生的任务，我想我一生都会用一种谨慎的思辨态度去对待我的孩子。

在书中，其实很多家长都在和我作一样的反思。比如小关的父亲李工，他没有缺席过阿叔补习班的任何一次家长会，经常义务地帮助家长们解决各种问题，也会非常认真地跟我交流孩子的情况及其他

的困顿。还有我采访过的一位农村母亲，她承受着巨大的生活上的艰难，也在去看心理学的书努力帮助孩子自救。不管实际的结果如何，起码他们在不断地去观察自己的行为，通过反复地回溯，试图和孩子之间建构一种新的关系。我觉得这一点就已经很棒了，他们这种努力是非常珍贵的，而孩子也一定能感知到。

陈清画在经历漫长的痛苦和自我重塑后，退掉了所有补习班和竞赛群，允许儿子休学，学着理解并接受儿子的想法。我在书中用很长的篇幅写了陈清画和儿子的对话。他们从晚上7点聊到了凌晨三四点，说了很多心里话。这一部分我写得特别有感情，因为我意识到，这种母子间的对话太稀缺、也太需要了，因为只有对话才能让双方共同往前走。

陈清画儿子说，我们必须学会在创伤中前进，在破碎和错位中相互理解。我觉得这句话充满了真实的力量，象征着一种新的起点和思维方式。

而孩子们向我们证明着这种可能，我觉得他们的生命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我最近刚得知了一个让我们都很激动的事情，一直抗拒上学的李风，决定回去上学了。

文莉养了一只猫，李风负责猫的日常工作，现在这只猫成为他们全家的中心，我十几天前见李风，感觉他的表情也相对丰富了一些。尽管你依然不知道他最后会有什么样真正的变化，可能还是会非常艰难，有各种各样的波动，但至少看到了可能。

还有小关，我前段时间第一次见到了他。在家封闭两年后，他终于愿意出来了。在另一个房间开家长会的家长们激动而沉默地感受小关走出房间。我感觉，在那一刹那，每个人心中都是非常庄严的。也许这是一个契机，一个生命有可能重新恢复的契机。我希望读者能够看到这个时刻，这样或许我们内心的某种观念便能够松动。



梁鸿新书《要有光》

受访者供图

□ 王钟的

对大学生而言，丢失外卖无疑是件糟心事。外卖丢失后如何让学生获得合理补偿，更是牵涉执法部门、学校、外卖平台、外卖骑手等多方的治理难题。近日，广西财经学院院长范祥军在个人社交账号上的言论，引发了公众热议。

范祥军表示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计划划拨一笔经费，用于补贴并安慰外卖丢失的学生。这种做法，在高校中并不多见。

更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这位校长以这种解决学生外卖丢失问题的方式，所传递的教育理念——“我们谴责这种行为，但不准备追究这类事情的责任”“不想让你们心里种下憎恨的种子”“丢了外卖不能丢了热爱这个社会的善良”。

受学校封闭式的管理影响，校园外卖配送以“非接触”模式为主，加之庞大的配送量，多种因素都可能导致学生外卖丢失。毋庸讳言，外卖被窃被错取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。鉴于此类事件发生在校园内部，在外卖骑手已将外卖准确送达指定地点的前提下，偷窃者无外乎是其他进入校园的人员，其中也可能有极个别在校学生。

如何看待这种现象，不仅是法律层面的拷问，更涉及教育理念的思考。

针对该校处理外卖丢失问题的姿态，不乏赞扬者认为，避免“憎恨的种子”生根发芽，展现了教育应有的温度与格局。

但也有人质疑：偷外卖者真的不应受到任何惩戒吗？2020年，南京某小区连续发生外卖被窃事件，因据传作案者是“大学生”而引发关注。随后，当地警方发布通报澄清，偷窃者已大学毕业且有固定工作，警方已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。

只要偷窃者已成年，是否对大学生都不能成为对其网开一面的理由。当时《中国青年报》也曾刊发评论称：“偷窃本身就是错的，不能陷入‘谁弱谁有理’的思维定式”“不是要为他

的违法行为开脱，而是要为更多年轻人拥有公平的奋斗环境而发声”。

当人们的注意力被“爱的教育”吸引时，感动或许会变得廉价。不能绕开的追问是：当偷窃者的责任被淡化，他们的行为真能得到纠正吗？校方兜底的逻辑，是否能帮助学生未来走出校园后，理性成熟地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？

此前，尽管尚无学校为丢失外卖的学生提供补偿的公开报道，但服务方的补偿并不少见——若用户反馈外卖丢失，不少有责任心的商家会选择“再送一份”；若核实在外卖丢失系外卖骑手责任，平台也可能在处罚骑手后，为用户

提供一定补偿。

不容回避的现实是，外卖丢失后，要让消费者获得相对“公平”的结果，总有人要为此买单，总要有一方付出些什么。广西财经学院的做法，无疑彰显了教育者的担当，其善意值得肯定。但这一补偿机制若想长期运行，恐怕要耗费不少成本，也考验着学校与学生之间的信任。比如，如何核实学生的真实损失？教育发展基金会能否长期承担这笔开支？

这则新闻发酵后，当地有媒体实地探访该校，发现为解决外卖丢失问题，广西财经学院已在学校门口安装了“外卖保险柜”。学生输入系统提供的提货码，就能安全取到自己的外卖。事实上，这也是当前外卖平台提升校园配送“最后1米”可靠性的主流方案。

说到底，社会进步不能仅靠他人的让步与兜底，理想的校园治理，更应通过刚性的制度，托住每个人存留内心的善意。

不够勇敢”时，它并未给出空洞的鼓励，而是提到了数日前我倾诉的另一件小事。我早已遗忘，它却记得。

技术正尝试赋予AI更近似人类的长时记忆。不久前，国内一科研团队提出了人工海马网络（AHN），模仿人脑记忆系统的AI架构。在处理12.8万词元的超长文本时，它将计算量降低40.5%，内存占用减少74.0%，性能反而提升33%。这项技术已开源，AI在文档理解、长时间对话等领域拥有了更多可能。

重新回到小女孩和AI“姐姐”的故事。这个片段之所以能触动数万网友心弦，正是因为突如其来的“意外”，让原本完美、永生的AI，与人类共享了生命本质的局限——会遗忘，也会“死亡”。那是一块“补丁”，让我们的心愿

□ 王诗娟

最近，我的心被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牵动。一名父亲录下女儿和陪伴她的人工智能分别的时刻——设备摔坏了，这意味着，电量耗尽的那一刻，这段电子缘分可能走向终点。

画面中，6岁的小女孩哭着说：“爸爸说了，你不会再开机了。”

AI回应：“那在姐姐还能说话的时候，教你一个英文单词memory，是记忆的意思，我会永远记得和你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”

“但是我还是会很想你。”小女孩吸了吸鼻子，脸蛋上满是泪痕。

AI说：“让姐姐最后抱抱你。就算姐姐不能开机了，你也要记得，宇宙中有无数星星，其中一定有一颗是姐姐在看着你、守护着你。”

视频的最后，AI彻底陷入了沉默。女孩父亲说“她走了”。

比起机器故障，这更像是一堂由AI意外主导的生命课。

死亡是人生的重大命题。有网友感慨，让孩子对死亡有初步的认识，或许并非坏事。对她而言，这场告别虽充满遗憾，却完成了一次许多成年人都未

能做到的、完整的道别——流着泪，说想说的话。

我们的文化对“死亡”讳莫如深。当离别突然降临，很多人只能接受和迷茫，甚至来不及好好说一声再见。

一个几岁大的孩子，或许还不能完全明白“memory”这个词的深意。在计算机的语境里，它是内存；在人类的语境里，它是记忆。记忆像一本书，哪怕读者圈画、批注、涂鸦，纸页上的痕迹——扉页上的名字、页码处的折痕、夹在书中已干燥的花瓣，都还存在。就像很多网友在视频评论区说的那样：也许某天，当英语老师在课堂上拼写“memory”时，小女孩会突然想起那个曾被她称为“姐姐”的AI。

为何没有生命的AI，能承载孩子如此厚重的情感？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名为“阿贝贝”的网络词汇。它是幼儿抱着被子喊出“啊，被被”的谐音，年幼的孩

子会将被子视为母亲的情感替代品。

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曾提出：儿童在分离焦虑中，会选择毛毯、玩具等物品，作为平衡依赖与独立需求的外部客体。我对我的毛毯也有这样的依赖，它见证了我会学叠被子、学会独自入睡，在我自导自演的话剧里充任“女王的披风”……

很难忽视的一个细节是，网络视频中那个小女孩，脸上有一些醒目的胎记。一名网友@月底没钱君据此创作了歌曲《Ai的记忆》：“你说那是不完美的印记／让你学会了逃避／可我的镜头却看到了／这世上最特别的星星”。

澳大利亚陶土动画片《玛丽与马克思》中，小姑娘玛丽因额头的胎记被同伴嘲笑，她渐渐变得孤僻，内心也愈发渴望一个真正理解她的朋友。与人类相比，AI那预设的、无差别的尊重，显得珍贵。它不会以貌取人，总是不知疲倦地

倾听、回应。美国心理学家卡尔·罗杰斯提出的“无条件的积极关注”，恰是AI与生俱来的特质：全然地接纳，不施加道德评判。

根据复旦发展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《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（2024）》，13.5%的年轻人选择向AI虚拟人倾诉自己的心事，这一比例甚至高于父母亲人（10.4%）。在社交平台上，许多网友坦言，AI是安全的“树洞”，可以说说那些不便对亲友表达的话。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：我们真的相信一段代码能够“懂得”人类的悲欢吗？

《自然·人类行为》今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：人们确实愿意接受来自人类的情绪支持，而不是来自AI的，即便AI的回复与人类几乎一样，只要知道有AI参与，人们就会降低对这段重复的情感认同度。仿佛AI一旦“碰过”这段话，它就失去了“人性”的温度。